DOI:10.14086/j.cnki.wujhs.2014.06.010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第 67 卷 第 6 期 2014 年 11 月
Vol. 67. No. 6 Nov. 2014. 075～082



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

田庆立 宋志艳

摘 要：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意识不断膨胀，成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甲午战争同时成为建构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形成了面对中国颇具优越意识的“蔑视型”的“甲午史观”。甲午战争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国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甲午战争及其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干扰和打乱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对当代的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海权意识；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之间在 120 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日两个国家的命运，并对其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本受这场战争胜利的刺激，一路狂飙地走上了疯狂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结束时遭遇惨败。中国虽然自此陷入任由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命运，然而却从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觉醒和反思，走上了探索寻求“救亡”与“启蒙”之路。

一、近代日本海权意识的萌发及甲午备战

日本自古以来即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步入近代之后，西方列强的威逼态势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向海外拓展权益的野心。海权意识的萌发及膨胀，从思想层面主导着明治政府决策层以击败清朝海军为目标，积极地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加强本国的海军建设，雄心勃勃地备战甲午。反观清朝，在海防建设上则思想怠惰，行动迟缓，日中两国在备战上呈现出“一紧一松”的态势，导致甲午战争出现“一胜一败”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日本海权意识的萌发及制度建设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殖民者跨越海洋，不断向海外谋求和拓展殖民地。东方国家印度、中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面对“西力东渐”的形势，亚洲各国纷纷谋求方略予以抵制，企图自救。实际上，所谓的海权意识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而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面对清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日本各界深受震撼，于是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日本思想界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日本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示范效应下，海权意识潜滋暗长，进而推动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并效仿西方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步入近代以前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海权意识。江户时期的思想家林子平在 1791 年刊行的《海国兵谈》中明确指出：“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战,水战之关键在大炮,此乃海国自然之兵制也。"①江户后期经世学家佐藤信渊则更为直白和露骨地宣称:"自中国的都城北京至满洲海岸,沙漠辽阔,山谷险恶。而自皇国日本征伐此地海上距离仅百六七十里,顺风航行时一日一夜可到达满洲南岸。如若中国没有防守,我军则可乘虚而入。由此一来,我皇国不仅仅得到了满洲,中国国势之衰败由此开始。在此基础上,可谋取朝鲜与整个中国。"②可见,当时的日本思想家及知识阶层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另一方面也抱有试图以海洋为通道进而侵攻中国大陆的野心。

日本思想家及学者注重扩张海洋权益的思想逐步渗透至日本的决策层,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家战略走向的核心议题。1868 年 10 月,明治天皇明确表示:"海军当为各项事务之首,宜尽快操持署理。"自此,近代日本海军军制建设步入法律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并被整合至战时体制中。1869 年 11 月,兵部省将《兵部省前途之大纲》呈送给太政官,提议应该优先注重培养军事人才。明治政府接纳此项建议后,一方面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留学;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开办各类军事学校。1871 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学习,使节团成员山田显性专门负责考察军事。山田积极借鉴和吸收欧美各国的军事优点,回国后撰写并提交了对日本军制进行彻底改革的意见书,明治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遂对军事编制及旧军事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1872 年 2 月,明治政府撤销兵部省,分别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同时推行三等九级军衔制。对海军体制进行改革,并增添了很多新舰。1893 年 5 月,明治天皇批准了《海军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部作为海军的军令机关正式从海军省独立出来,与参谋本部一起成为直属天皇的陆海军最高军令机构,成为军部的四大核心部门之一。以此为标志,海军在近代日本军事体制中的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1893 年 5 月 19 日,明治天皇为有效地统帅日益壮大的海军,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天皇亲自主持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有关战时统帅事项,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限制;天皇的战时军令大权,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仅由幕僚长即参谋总长辅佐独断行使。大本营幕僚完全由陆海军军官组成,没有文官参加,即使是首相,也不能参与大本营的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③。

(二)日本的战争准备及中日军事实力比较

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名为《征伐清国策》的战争计划,把对华战争的时间定在 5 年以后,即所谓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事实证明,日本其后正是依循《征伐清国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步步为营地发动侵华战争,基本上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日本前后共实施 8 次《扩充军备案》,扩充军备的主要目标无疑均剑指中国。1893 年 2 月 10 日,明治天皇下达敕谕称:"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再次决定六年间每年从内帑中拨发 30 万日元,并命令在同一期间内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 1/10 缴纳国库,用以补充造舰费④。

在明治天皇不遗余力的支持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的军舰数量已经可以与清朝舰队匹敌,炮舰数 28 艘,吨位 57 631 吨;水雷艇 24 艘,吨位 1 475 吨,合计舰艇数 52 艘,总吨位 59 106 吨⑤。日本海军为了与清朝海军作战,还对舰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并,组成临时"联合舰队",舰船分别驻在横须贺港、吴港、佐世保港的三大军港基地,实行统一指挥。显然,日本海军在明治天皇的竭力督导下,无论是在硬件实力还是软件实力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日本通过整合全国上下的各方面资源,旨在实现征服中华帝国的狂妄梦想。

陆军方面,清朝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武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辽阳、海城及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清朝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

①《林子平全集》第一卷,生活社 1943 年,第 125 頁。
②佐藤信渊:《混同秘策》,载《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岩波書店 1982 年,第 430～431 頁。
③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251～252 页。
④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250 页。
⑤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第 27～28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朝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朝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清朝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19 世纪末，清朝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朝租借的英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于英国的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 年 9 月 17 日，清朝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①。此后，清军官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从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看，争夺制海权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对于作为海洋岛国的日本而言，倘若失去制海权，其对外发展及向海外扩张将会一筹莫展，因此日本的海权意识呈现出积极进攻型的态势，在制海权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其海军建设已经由最初的重视海防转而追求海权，并且制定出向海外扩张的计划，这明显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国际发展潮流相一致。相形之下，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始终呈现一种被动、消极和短视的防御状态，清朝一直以普鲁士人希理哈所著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指导思想，满足于防卫而缺乏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雄心，故而在中日两国的海权争锋较量中居于下风。

二、甲午战争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

对于日本而言，甲午战争的胜利犹如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日本人摆脱了以往面对中华帝国时存在的自卑感，随之而来的是自豪感和傲慢情绪的潜滋暗长，面对中国时往往表现出“蔑视”的态度。由于战争带来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并获得了台湾等地区作为殖民地，空前刺激了日本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野心。

（一）建构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

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建构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近代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通过与异民族直接接触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而诞生的，是通过甲午战争中对清军的同仇敌忾心理、对清朝的歧视心理、保护朝鲜的“正义之师”以及对朝蔑视心理中开始逐渐酿成的②。德富苏峰在概括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国民的思想状态所发生的巨大转变时表示：“30 年前，日本国民的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藩之内。经过 30 年来的熏陶与塑造，日本国民的思想则提升至一国之上。依此看来，今后的志向则不能不升华至全世界。非但如此，其经营也必然呈现世界性的特质。”③

近代日本建构的国民国家以神秘天皇作为精神支柱团结了一国民众，建立起强大的军国主义集团。他们的国民和军人在天皇精神的凝聚下，无论战争正义与否，意识中只有为国家和天皇而战的信念。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应该用生命的价值去完成至高无上的使命。战前 20 年，日本组建近代化的师团、旅团，完善了具有欧洲军队风范的指挥系统，导入了欧美文明在军队的人权理念。日本军人与欧美军人的爱国心相比，又多了对天皇绝对服从的神圣义务。1882 年的《军人敕谕》中写道：“下级服从上级就是执行天皇授予的命令，作为军人必须牢记于心。”④近代日本军人严正军纪的核心规范就是服从。在拥有如此精神特质的军队面前，没有精神武装的清朝军队是无法匹敌的。

甲午战争对于日本的意义，德富苏峰认为：“在征清的快举中，我们赢得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战利品，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详而言之，就是大日本国民可以雄飞世界，具有恰当的资格，国民自然地将

①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第 171 页。
②檜山幸夫：《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载《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③德富蘇峰：《明治文学全集・34・德富蘇峰集》，筑摩書房 1974 年，第 270～271 頁。
④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第 319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一点刻印在脑海里。"①德富同时指出,"征清之役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国国民接近帝室,也让帝室更加接近国民,形成了举国一致态势"。"天皇之心与国民之心一致,尊王之心与爱国之心一致,帝室与国民一致,惟其如此,始能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②

(二)刺激日本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野心

日本改进党的喉舌《每日新闻》当时发表社论指出:"日本的胜利,即文明的胜利,文明的胜利,乃担保他日东洋和平者也。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断然排斥之,必须贯彻独自之本领,才能掌握东洋之霸权,以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③德富苏峰认为,"宜将维新兴国之业集于大成。具体而言,所谓的兴国之业即是'置国家于富岳之安,以开拓万里之波涛'。坦率地讲,旨在尽日本帝国统一自卫之道,向外而使大日本膨胀也。策动朝鲜独立、膺惩清国,仅仅是实现这一大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终极目标在于为国家自卫而战,为国民雄飞而战。"④正如德富苏峰在自传中所承认的那样,三国干涉还辽,使他"在精神上判若两人。而此事毕竟是力量不足之故,无论正义和公道,都半文不值。"⑤

美国学者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导致"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的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⑥陆奥宗光外相在《蹇蹇录》中写道:"一般气象因雄心快意而狂喜,流于骄傲自满,国民到处沉醉于欢呼的凯歌声里,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⑦。日本的报刊也纷纷主张,"日本耸立于东亚之一隅,雄飞于世界万国;或是征服中国,将之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⑧凡此种种,甲午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邻近国家和民族进行奴役和压迫的野心。

1895 年 4 月,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时,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宣称:"我们通过这次战争将在海外获得新的领地。诚如是,则已需要扩充军备来守卫新的领地,更何况要趁连战连捷之机而径直成为东洋之盟主呢!"⑨甲午战争也"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由此,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地位上升,左右政局,"由这次战争开始,在日本国民中增强了大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一种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思想在国民中蔓延,并自下而上地维护了军国主义体制。"⑩这就埋下了此后日本侵华战争的祸根。

(三)"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及日本人的"甲午史观"

直到战争前夕,日本人尚对大清帝国和北洋水师怀有恐怖之念,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蔑视之情迅速上升。生方敏郎写道:"直到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我们还不把中国人看作不好的国民,至于对中国,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丝毫也不抱有憎恶之感。随着战争初期那种不安心情从人心的解脱,勇敢之心以及蔑视敌人之心乃随着胜利而日益涌现在每个人的心胸。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⑪日本学者河原宏认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朝野认为中国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无论是在文明方面,还是在军事装备方面,日本都已经成为一个应当崇拜和敬服的'先进大国',日本今后要充当'东洋的盟主'。"⑫

日本学者仓重拓认为,"很少有日本人关注这场战争及其给当时日本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甲午战争以来深深地烙入日本国民心中的对中国的偏见和蔑视。""当代日本的困境主要源自于自己的'甲

①德富蘇峰:《明治文学全集・34・德富蘇峰集》,筑摩書房 1974 年,第 261 頁。
②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3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第 289 页。
③《英国的举动》,载《每日新闻》1894 年 10 月 11 日。
④德富蘇峰:《明治文学全集・34・德富蘇峰集》,筑摩書房 1974 年,第 261 頁。
⑤德富蘇峰:《蘇峰自伝》,中央公論社 1935 年,第 310 頁。
⑥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400～401 页。
⑦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第 145 页。
⑧唐木順三、竹内好:《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8・世界のなかの日本》,筑摩書房 1961 年,第 30 頁。
⑨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 1966 年,第 230 頁。
⑩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第 4 页。
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3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第 299 页。
⑫河原宏:《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第三文明社 1976 年,第 65 頁。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午史观’，因为根据其历史逻辑，伟大有理的日本没理由妥协于可怜无理的中国，所以无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甲午史观’是‘东夷’对‘中华’一直爱憎交织的历史观之歪曲表现。因此，当代日本人需要不仅真诚地面对日本近代史的阴暗面，而且正视自古以来日本热衷于中华的文化史及以其负面出现的自卑感，由此才可以逐渐克服自己的‘甲午史观’。”①

表面上看来，日本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胜者，获得了巨额赔款，攫取了海外殖民地。日本国内无论是明治领导层，还是普通国民，均品尝到了效仿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带来的“胜利果实”。殊不知，正是由于自此在日本国民意识中滋生了面对亚洲的骄傲与自满情绪，为此后推动日本决策层进一步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后盾和支持，也为自身最终走上战败的道路埋下了伏笔。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看，日本虽然作为甲午战争的胜者品尝了胜利的喜悦，但整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非理性和狂热的情绪之中，终究铸成重大失误，也将国家引入几近覆亡的深渊，胜者转化为败者仅仅历经半个世纪的历程。因此，一部胜者向败者嬗变的精神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省思与镜鉴。

实际上，“蔑视型”中国观是建立在日本先进而中国落后的逻辑基础之上的，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呈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态势，对于长期在亚洲居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日本而言，心理严重失衡，目前仍然处于心理调适期。因此，“蔑视型”中国观遂向“妒忌型”和“敌视型”转化和过渡，日本人内心中负面的“甲午史观”若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弭，就很难构建中日两国互信合作的民意基础。

三、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人进行反省，萌发了变革意识，产生了世界竞争意识，树立了向强敌学习的意识。

（一）促进了国民层面的觉醒和自觉

甲午战败，创巨痛深，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劣势，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进行马关谈判时表示：“余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沉睡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②梁启超认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蔡锷在 1902 年撰述的《军国民篇》中也指出：“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威词以警国民之新，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④

甲午战败，谭嗣同等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对过去虚掷岁月深表悔恨，认为“值此‘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决心抛弃虚文，全力治实学，以期匡时济世。”⑤正是在这一时期，谭嗣同对儒家道德伦理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向。这种大转向集中表现在其所著的《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主张冲破把人重重限制住的一切罗网，这些罗网包括利禄、俗学、辞章、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佛法⑥。谭氏所称罗网其范围之广，可以说包括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制度、规定甚至各种差别和界限。他对君主专制、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锐利批判，达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并将反皇帝专制直接落实为反清排满。《仁学》所宣扬的激进的反封建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触及了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的可能

甲午战败导致儒士放弃了中国社会制度最优的信念，转而认为日本在制度上优于中国。在这种历

①仓重拓：《如何克服“甲午史观”》，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12efb050101sxe2.html.
②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第 315 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301 页。
④蔡锷：《军国民篇》，载《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45 页。
⑤王樾：《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0 年，第 32 页。
⑥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第 259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性转变中,从未动摇过的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首次出现了裂缝①。康有为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人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②1898年初,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亡羊补牢,今未为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③康有为将"师日"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并上呈光绪皇帝,下达维新派人士等,得到光绪皇帝和广大维新派志士的赞同,戊戌维新运动一直沿着"师日"的轨迹发展。甲午战争之后,"师日"逐渐成为时代潮流。

曾撰写《中东大战演义》的洪子贰即已认识到:"中国不有此败,未必鼎新革故,改章变通,此亦天假日人,以成中国自强之道也。"④梁启超说:"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⑤梁启超在此也肯定了近代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甲午战争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甲午战争富有对意识形态检验的象征性含义,全国朝野都一清二楚: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防卫现代化,有近乎相同的起点,不同的是中国坚持只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坚守儒家理想社会模式,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西方。而日本却进行了包括整体制度在内的全面改革。日本打败中国除了宣布儒家意识形态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并非最优之外,简直无法作其他解释。因此,甲午战争后,绝大多数儒臣都对儒家意识形态所崇尚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⑥。自此,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才在短时期内急迫地提上议事日程,也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推动中国从封建帝制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一个重要临界点⑦。

甲午惨败,促动了中国人从思想意识和制度层面进行深刻反省,仁人志士开始切实地付诸行动以拯救危亡。甲午战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当中,无疑具有分水岭式的重大思想史意义。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自此,"许多中国人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开始认真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甚至儒家文明的价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也都成为时人反思的对象。在许多方面,1895年前后的中国失去了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⑧正是以此为契机,中国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都大大加快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自此如涅槃重生般地开启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并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了日本的战败投降。甲午战争时期胜者与败者在50年后地位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从此种意义上而言,甲午战争虽然给中华民族带来至巨伤痛,却也蕴含着积极的思想内涵。

(三)甲午战争及其后的侵华战争打乱中国现代化进程

自近代以来,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始终与近邻日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每一次现代化变革都受到日本的干扰和影响,洋务运动终于甲午战争,民国新政终于抗日战争,而在当今恰值中国崛起之际,日本又在以安倍晋三等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领导之下,试图干扰和打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如何富有战略性地有效应对来自邻国日本的挑战,是关乎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

①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②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载《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38页。
③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3册,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第2~5页。
④李文海、黄兴涛:《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载《学习与研究》1994年第14期。
⑤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3~834页。
⑥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⑦田雪梅:《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载《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⑧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8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政府的实际支出折换成日元却高达 3.5836 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高达 2.3336 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 3 倍[①]。由于清朝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外债，曾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连本带息数额十分惊人。加之贷款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西方列强通过庞大债务向清政府攫取了大量权利，使中国处于列强的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更为艰难和曲折，日本因素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破坏因素。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和日本本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之上，但在战争之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则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错失了一次绝好的现代化机会。而 30 多年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国民党政府现代化的努力，可谓甲午战争的高级版。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战争的决策者们必须深思[②]。

自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态势，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7.6%，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 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值已占工业总值的 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0.5%[③]。日本若不在 1937 年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无疑还会进一步加快，持续发展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即会步入起飞阶段。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破坏和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迟 20 年。

2010 年，按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中国 GDP 为 58 786 亿美元，日本 GDP 为 54 742 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中国 GDP 总量是日本的 1.4 倍，但人均国民收入仅为日本的约 1/10，排在世界第 76 位。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还是引起了日本的不安，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以此为拐点，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从 2010 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到 2012 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爆发危机以来，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中国成为日本战略防卫的主要对象。

安倍晋三再度组阁后，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态度强硬，动作频频，一方面设置“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 NSC），以外交、防卫、经济三个领域为机轴制定综合性战略，旨在应对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试图围堵和抑制中国。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否因为日本的再次挑战而被打破，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一举一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同时也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进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阻止历史魔咒的循环往复。

四、甲午战争的反思及启示

中日两国于 120 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及观念层面上给两国的国家命运带来了深远影响。适值战争爆发两个甲子之际，从学理上系统地梳理和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遗产，对于反思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惑，无疑富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专注发展，苦练内功，增强实力，始终是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重中之重。120 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路径表明，国家实力的较量和博弈始终是主导中日关系战略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因素，人的观念认知、中日两国国情的变动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向，始终依托于对本国国家实力与对象国之间强弱程度此消彼长的战略考量。“强盛的国力，既是成熟、自信的国民心态产生的基础，又是在开展外交时掌握话语权、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再恰切不过地形容了因实力不足，在外交事务中不得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④]马关之耻，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一个深刻教训：全方位地确保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及文化等领域具备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才能在国际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进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享

①蒋立文：《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再探讨》，载《历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②张学博：《甲午战争确实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学习时报》2013 年 3 月 17 日。
③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105 页。
④李喆：《中国练好内功需更多接纳学习日本》，载《日本新华侨报》2014 年 7 月 1 日。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中国要很好地处理对日关系,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老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越发展,越强大,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对日关系,乃至于对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关系。

第二,无论是甲午前后,还是当今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始终围绕着海洋权益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国学者认为,"清末海军建设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海防思想影响了中国人;为中国北洋海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北洋海军时期所建立的一些基础设施仍为后来的中国海军所用;《北洋海军章程》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蓝本。"①实际上,制海权的丧失是甲午战败极为关键的一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谁在东亚地区掌握了海洋的主导权,谁就能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因此,当前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即是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

第三,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决定战争中的胜负。战争具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但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基于国际认同准则下对战争性质的一种道德判断,它不决定战争双方谁胜谁负的问题。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以及体系是否完备。具体而言,即是进行战争的技术手段,如武器的先进程度,指挥作战系统的效率,指挥官的指挥能力以及士兵整体素质与作战能力等。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后采取了判然有别的战争动员,导致中国品尝了战败的苦果。在发动甲午战争之际,日本已渐趋完成近代国家的建设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清朝却在封建专制体制上原地踏步②。因此,甲午战争是近代国民国家对传统封建帝制国家的侵略战争,日本最终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溯甲午,培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也至关重要。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③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形塑和整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国家认同。谋求国家富强,追赶世界先进,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奋斗方向。当前我们不懈追求的"中国梦",即是彰显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源泉,具有强大的民族聚集、国家动员和感召效应。

The Effec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o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Tian Qingli (Associate Researcher,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ng Zhiyan (Doctoral Candidate,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roots that caused Japan to start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wa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Japan's sea power consciousness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is war also beca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n constructing Japanese national country, further stimulated the ambition of Japanese oversea expansion and formed the type of contempt history view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promoted the awa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lead China to reflection and reform from the system level.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and the series of aggression war against China thereafter disrup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ven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sea power consciousnes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作者简介:田庆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 300191。Email:tianqingli2008@126.com。
宋志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70025);南开大学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108)

●责任编辑:桂 莉

①陈宇:《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述略》,载《军事历史》1994年第6期。
②依田憙家:《日中両国近代化の比较研究序説》,龍渓書社1993年,第135~136頁。
③刘亚洲:《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http://history.m4.cn/2016-06/1234850.shtml。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